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上）

南開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中心

主編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第一二三冊

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上）

伯希和著 耿昇譯



中國書店

本册說明

法國極負盛名的東方學家和漢學家伯希和，曾在中國新疆和甘肅各站進行“學術探險”活動，特別是在敦煌地區從事考察活動，並且掠奪了文物文獻。在對敦煌地區的石窟考察中，伯希和記錄了大量筆記和手稿，本書《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是在伯希和去世後，後人通過整理其筆記和手稿而出版的。在筆記中，伯希和對石窟進行了編號，在描寫石窟時，還將所有的題識和游人題識都記錄了下來。總的來說，筆記內容包括石窟描述、石窟年代、壁畫的考訂以及題識解釋。

本書按照筆記內容，共分為六卷，依次整理出版。在第一卷筆記中公布了沙洲千佛洞第 1—30 號石窟，向研究人員提供了一部長期以來難以到手的材料；第二卷，包括對第 31—72 號石窟的記述以及已辨識的題識的錄文。本卷涉及到了中國藝術史上占有重要意義的石窟，以及幾個供養人家族歷史的題識。第三卷，伯希和主要描述了第 72—111a 號石窟以及抄錄下來的題識。在第四卷中，伯希和介紹了第 112—120n 號石窟，這組石窟往往很小，但占據了莫高窟遺址的中心地帶。第五卷描述了第 120o—146 號石窟，這是非常複雜的一組石窟，文中將會作出論述。第六卷，也是最後一卷，描述了 146a—182 號石窟，在該卷中，伯希和描述了裝飾莫高窟壁畫，並且記錄下了有關漢文或其他語言題記的錄文。

耿昇譯
伯希和著

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上）

新編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險與

法國的敦煌學研究

(代 序)

耿 昇

敦煌藏經洞的開窟、敦煌文獻的發現和敦煌學的誕生，已經 100 餘年了。明年又恰恰是法國伯希和敦煌劫經的 100 周年（1908—2008 年），我國西域與敦煌歷史文物和文獻的外流，其實已經遠遠地超過了 100 年。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險、考古學家們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國探險家、語史學家、東方學家和漢學家伯希和的西域敦煌探險，則頗為引人注目。本文試對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險團在我國新疆和甘肅各站，特別是在敦煌從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鉤沉，以對《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的大歷史背景作以介紹，以饗我國學術界。

一、伯希和西域探險團的緣起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和敦煌劫經，是當時國際大歷史背景下的產物。

自 19 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列強對海外殖民地分割完畢之後，又掀起了一股西域探險考古熱潮。其間，俄、英、德、瑞典、美、芬等國進入西域並從事科考探險的時間，要比法國早一些。西方列強在西域探險問題上，也如同在

爭奪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場一樣，始終都勾心鬥角，互相傾軋。號稱“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借助于印度的有利地位和阿古柏對新疆侵擾的機會，首先妄圖染指我國新疆，于1834年派遣沃森（W. H. Wathen）赴于闐進行考察，派約翰遜（W. H. Johnson）于1865—1866年考察于闐，派沙敦（R. B. Shaw，邵烏）于1870年考察葉爾羌與喀什，派佛塞斯（T. D. Forsyth）及其同伴于1873年考察喀什與塔里木盆地周邊地區。英國探險家賈斯理（Carey）和達爾格萊斯（Dalgleish）稍後于1886—1887年也前往同一地區搜掠文物，鮑爾（Bower）少校利用追捕殺害達格萊什的逃犯的機會而于1889年到達沙雅。但這些英國人直到此時仍未考察清楚，究竟應將塔里木文化歸屬於哪一種文明，直到斯坦因受英國政府派遣，于1900—1901年第一次西域探險為止，這種無知局面纔略有改觀。

早就對中國新疆垂涎三尺的沙俄帝國，更是迫不及待地派遣文武官吏對塔里木盆地南緣與喀什地區進行考察。如普熱瓦爾斯基（N. M. Przeval'skji）于1870—1885年4次分別對羅布泊、且末和阿爾金山諸綠洲進行考察。1885年，格倫伯切夫斯基（B. L. Grombêcevskii）在塔里木盆地西緣從事考察發掘。1889—1890年間，佩夫喬夫（M. V. Pevcov）、羅博羅夫斯基（Roborovskii）、博格達諾維奇（Bogdanovie）和柯茲洛夫（P. K. Kozlov）分別對喀什、天山南麓、葉爾羌河上游地區作了考察，帝俄駐喀什領事館秘書雅·雅·魯特斯（Ya. Ya. Lyuts）搜集了一批古文獻并入藏于艾爾米塔日（列寧格勒）博物館。貝林格（Belinko）和帝俄駐喀什領事科洛科洛夫（G. Kolokolov）則將其搜集品入藏于帝俄科學院的人類學和

民族學博物館。帝俄皇家考古學會東方部根據 1891 年 11 月 28 日的會議紀要，而向彼得羅夫斯基發去了一份有關在喀什地區從事考古發掘和科學考察的調查提綱。帝俄皇家科學院與考古學會于是在 1897 年派出由克萊門茨（D. A. Klementz）率領的考察團赴吐魯番和塔里木盆地從事發掘工作。

瑞典人斯文·赫定于 1890—1902 年間三次赴西域進行考察。由格倫維德爾（Grünwedel）、胡特（Huth）率領的德國考古探險團，于 1902—1903 年首開四次大規模西域探險之先河。由渡邊哲信和堀賢雄率領的第一個日本大谷探險團，也于此前後到達塔里木盆地。

這些考古探險團都大肆非法發掘、采集、收購、騙取和盜竊了大量中國西域文物，以豐富他們各自國家博物館與圖書館的收藏，其目的仍然是為殖民主義擴張服務。

在西方和日本競相向中國西部派遣考古探險團的熱潮中，老牌的殖民主義者和尤為注重文化爭奪的法國却珊珊來遲。但在 19 世紀下半葉，也有幾名法國旅行探險家曾先後進入過西域。如博安（C. E. Bonin）于 1899—1900 年、呂推（Dutreuil de rhins）和李默德（Grenard）于 1889—1894 年、沙畹（E. Chavannes）于 1907 年、古伯察（E. R. Huc）和泰神父（Joseph Gabet）于 1843—1845 年，多倫（d'Ollone）于 1906—1907 年、邦瓦洛（G. Bonvalot）和奧爾良（Henri d'Orléans）于 1895—1896 年都曾赴西域不同地區旅行探險。雖然法國在西域考古探險起步較晚，人數較少，但搜羅的文物與文獻却價值不菲。因為等到法國考古探險團遠涉西域時，雖然那裏的幾大重點考古發掘地點（喀什、庫車、吐魯番、敦煌、于闐）均被其

他國家的同行們捷足先登了，但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法國仍出奇招而獲得了高價值的文物。

西方列強在西域的科考與探險方面的競爭，主要是對文物古迹和考古發掘點的競爭，形成嚴重對峙的局面。爲了在西域從事更加系統而廣泛的考察，分工對幾大重點地區進行發掘，他們決定統一協調這方面的工作。1890年在羅馬召開的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西方列強決定組建一個“西域和遠東歷史、考古、語言與民族國際考察委員會”。1902年在漢堡召開的新一屆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這個西域國際考察委員會最終應運而生了。其總部設在西方列強中離西域最近的國都——俄京聖彼得堡。在國際委員會之下，還設立了各個成員國的國家委員會。這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慣用的劃定勢力範圍的老伎倆。

西域國際考察委員會的法國委員會，由法國著名東方學家埃米爾·塞納爾（Emile Sénart, 1847—1928年）任主席。塞納爾出身於豪門富戶，終生酷愛學術。他年輕時就深受印度佛教，特別是“北宗佛教”的吸引，成爲一名卓有成就的印度學家。他曾出版過有關巴利文語法、印度文碑銘、印度種姓制度、《正法華經》和《大事》（Mahavastu）的研究論著。他從1882年起便當選爲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院士，同時又受聘爲意、比、荷、俄、德諸國科學院的院士。他擔任法國亞洲委員會主席一職近30年，

曾大力推動籌建法蘭西遠東學院，也曾參與組織法國赴伊朗和阿富汗的考古活動，同時又兼任法國地理學會主席。所以，正是他積極提議和鼎力推薦派遣法蘭西遠東學院的漢語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率團赴西域考察，參加這場國際大角逐。

法國的既定目標就是，在這場激烈的國際大競爭中，法國必須占有與其國際名望和地位相匹配的份額。伯希和的中選是由于他學識過人，又富有在亞洲活動的經驗，精通多門亞洲語言并擁有這方面的高水平文化知識。該團中的另外兩名成員分別是法國殖民地軍隊的軍醫、原交州（東京灣）人路易·瓦揚（louis Vaillant）博士，負責地理測繪、天文觀察和自然史方面的項目；專業攝影師夏爾·努埃特（Charles Nouette），負責拍攝照片、圖片資料和檔案保管。整個探險團所需要的大部分資金由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法國科學院、公共教育部共同提供贊助。諸如法國商業地理學會、法國亞洲委員會和自然史博物館那樣的一批學術團體，諸如波拿巴王子和塞納爾先生本人那樣的一些熱衷于贊助文化教育事業的名流，也都慷慨解囊。奧爾良基金會的一筆逾期未付款也被劃歸伯希和支配，從而使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團置于一位大旅行家奧爾良的名譽保護之下。其實，伯希和于1901年剛從越南西貢醫院出院的那天，奧爾良王子恰恰于同一天逝世于同一家醫院，這既是一種巧合，又是一種“天緣”。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團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匆忙組建起來并興衝衝地出發赴西域，進行了近三年的考古探險活動。

二、伯希和西域探險團首赴喀什地區與圖木舒克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團一經組建，便立即開始了積極的籌備工作。他們在人員、資金和設備方面的準備工作，持續了一年多。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一行離開法京

巴黎，踏上了漫漫的近三年的西域考古探險之路。他們先乘火車，經過 10 天的旅行後便經莫斯科和奧倫堡，到達當時俄屬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干。他們在塔什干停留了一個多月。這是爲了等待其從聖彼得堡用貨船運來的大批行李設備。

伯希和也需要利用這段時間，突擊學習東突厥語。因爲作爲語言學家的伯希和過去祇從書本上學習過這種語言，而缺乏實際應用的機會。

伯希和一行乘火車前往安集延，他們一路上沿富饒的費爾干納河谷緩緩行進，那裏盛產棉花，遍地是森林和寶藏。8 月 11 日，他們到達距安集延祇有 10 餘公里的奧希（Och），最終下了火車，開始組織赴哈什的馬隊。沙俄地方當局爲他們找到了可供雇傭的哥薩克護衛隊，衛隊長是芬蘭裔男爵馬達漢（Emil Mannerheim，馬達漢于 1939 年出任芬蘭軍隊的元帥，于 1944 年又擔任芬蘭共和國總統）。馬達漢實際上是奉沙俄的命令利用伯希和探險團作爲自己進入中國的掩護以刺探中國西部軍情和掠奪文物。他們結隊而行，一直到達哈什。

伯希和一行于 1906 年 8 月間，率一支由 74 匹馬組成的馬隊出發，僅供馱行李的馬匹就多達 24 匹之多。他們經過塔爾迪克達坂（Taldyq Dawan，山口），再沿柯爾克孜牧場前進。伯希和還曾與阿爾泰山地區的柯爾克孜女王公之子阿塞姆（Assam）有過一次頗具學術味道的對話。伯希和一行最終從伊爾凱什坦或休循（Irkechtan）越過俄中邊界，再經過 20 天的旅行，最終於 1906 年 9 月 1 日到達喀什。這是他們計劃中于中國從事考古發掘的第一站。

在喀什，俄國駐喀什領事科洛科洛夫將伯希和一行安

排在俄國領事館的一座建築物中。英國駐喀什領事馬繼業（Macartney, 1867—1945 年，爲 1793 年出使中國的英使老馬戛爾尼之孫）公爵也經常去拜訪他們，并幫助他們組織駝隊。瓦揚聲稱，伯希和在俄國人、英國人和中國人中都頗有“面子”，這是伯希和以其淵博學問和豐富的語言學知識而贏得的榮譽。

由于其他國家的考古探險團已先于伯希和一行在喀什作過考古發掘，所以伯希和一行在那裏祇作過一次人類學調查。此外，他們還從事地理調查和對道路進行測繪。

伯希和一行在喀什逗留了 6 個多星期，因爲其最終目標是喀什東北約一月行程的庫車綠洲。在他們到達喀什時纔獲悉，德國人剛在庫車作過發掘，俄國人貝勒佐夫斯基（Berezovskii）正在那裏逗留。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伯希和一行分別從地理學、考古學和語言學等角度，對該地區作了考察，其考察工作集中在四個重點目標上。

距喀什北部 15 公里左右的三仙洞是喀什的一處名勝。在伯希和之前，英國的斯坦因、日本的橘瑞超、德國的勒柯克都曾對這裏做過考察。但不知爲什麼，伯希和始終稱此地爲“三山洞”，可能是由于誤聽而造成的。伯希和于 1906 年 10 月 10 日從喀什發出的一封信中，介紹了他的這次考察結果。三仙洞位于從喀什到七河的大道上，也就是在喀什城北 15 公里左右的那林河（Naryn）流經的地面上，于黃土高坡上開鑿了三眼洞。其土著名稱是（Utch-meravan）或（Outchmah-ravân），意爲“正在坍塌的和難以進入的三個洞子”。在伯氏之前，第一個也是以前唯一一個撰文描述過“三仙洞”的歐洲人，是俄國探險家彼得羅夫斯基（Petrovski），其描述文發表在帝俄考古學會

東方部的《論叢》第7卷中：《喀什附近的一處佛教古迹》。彼得羅夫斯基爲配合其文章，同時還發表了從大路一側拍攝的三仙洞照片以及他繪製的一幅平面圖。德國格倫維德爾探險團于1905年考察該洞時，其成員巴爾圖斯（Bartus）曾從山崖上用繩索滑入洞內。斯坦因第二次西域探險時，祇作壁上觀而未敢冒險進入洞中去。更富有探險精神的伯希和却率瓦揚與努埃特共同用滑車攀上了三仙洞。他們發現洞內的燒陶層是在原層被剝落之後，重新貼上去的。這應該是1815年的重修層。裝飾和繪畫風格都是漢地式的。洞中原來收藏的箭矢和木簡，已被彼得羅夫斯基的衛隊長盡數劫走了。洞中寫滿了游人題記，其中有漢人、蒙古人、滿族人和突厥人的，這大體上反映了當地民族的構成。赴三仙洞參觀考察的人具有各種不同信仰，除了漢滿兩族人之外，其餘幾乎都是兵勇。清嘉慶二十一年九月（1816年10—11月）由清朝將軍下令修葺的。最早的游人題記寫于1788年，所以，三仙洞的裝飾大部分都是乾隆皇帝于18世紀平定新疆之後竣工的，因爲塗層上寫有比繪畫更古老的題記。

伯希和繼瑞典傳教士霍貝克之後，也介紹了三仙洞的開洞原因。努埃特拍攝了現在很少見的幾幅三仙洞的照片，瓦揚對洞子作了全面的調查，詳細記錄了洞口、中部、後部和左右兩側各自的長度、高度和寬度，還記下了洞內壁畫內容，並錄下了壁畫題識和游人題記。事實上，考察三仙洞是伯希和西域大探險慶戰前的一次演習。

在三仙洞以東約兩公里左右的地方，于察克瑪克河南岸，便是圖古曼（Tegurman）遺址。伯希和將該遺址考證爲“水磨房”。彼得羅夫斯基曾提到過該遺址。1905年

的德國探險團和 1906 年的斯坦因也都曾提到過該地。斯坦因將該地名記作 Tigharman，後又改作 Khakan-ning-shahri，意為“大汗城”。但他却未考證清楚這個“大汗城”即水磨房。在伯希和探險團使用的地圖上，却作 Khanlya，意為“汗城”。伯希和認為該遺址群為佛教時代（似乎是由罕堵波和南牆保護的四邊形建築）和伊斯蘭時代（西部的“炮臺”或瞭墩以及介于炮臺和四邊形建築之間那座尚未被考證清楚的建築）的遺存。伯希和親自率領 10 名民工，對水磨房進行了考古發掘，獲得了一批陶片和一個銅鈴。

在從穆斯林的喀什到英吉沙爾古漢城之間大道的左側，便是“舊城”，或“古城”（Eski-chahr）遺址。彼得羅夫斯基從未講到過此地，斯坦因對它也僅僅是一筆帶過而已。伯希和認為應將它斷代為伊斯蘭時代，但却顯得相當古老。伯希和未對它做詳細描述，祇拍攝了一批照片，並繪製了平面測量圖。

對於喀什東北的漢諾依（Khan-öl, Khan-üi），也就是“汗宮”的著名遺址，伯希和作了重點發掘，特別是對其中“鴿子窩”（Kaptal-Kha-na）、薩喀爾牆（Saqahtam）和哈薩爾牆（Gasa Tam）、“九間房”（To-qqouz-Hod-jrah）等重要考古點都作了發掘和考察，並且均有不同程度的收穫。尤其是他還發現了一處尚未有人考證過的佛教遺址，發現了佛像殘片及幾枚錢幣。

對於喀什綠洲的前伊斯蘭文明古迹，伯希和主要對三個古遺址作了考察發掘。

第一個發掘點是“庫爾干罕堵波”（Kourghan Tim），伯希和又稱之為“庫爾干牆”或“庫爾干炮臺（瞭墩）”。

斯坦因曾對該遺址作過考察并留下了不太詳細的記述。

第二個考古發掘點是紅山（克孜勒—戴卜，Qyzyl-Debe），位于克孜勒蘇河故道左岸，距克孜勒蘇與土門河（Tmen）交匯處祇有3公里之遙。

第三個是“小山”（Kichik-Debe），位于紅山以西。

對於喀什地區的佛教遺址，伯希和考察了炮臺山（Mori Tim）、沙山（Topa Tim）、墩庫勒（Tong Kül）和阿克噶什（Aqqâch）等處。伯希和一行于炮臺山作了兩天發掘，在帕依納普村發現了一個所謂的阿布達爾人（Abdal）的小聚落。

1906年9月26日，伯希和探險團離開了汗宮，取道東南方向，前往墩庫勒。那裏是距汗宮有6—7公里的一片小綠洲。9月27日，他們前往阿克噶什，在那裏發掘了克孜爾炮臺（Qyzyl-Tim）以及朶哈炮臺（Qaqha Tim，tim指“牆”或“窄堵波”）。

伯希和在喀什地區搜集到的某些佛教文物價值有限，雖然它們都是絕無僅有的。如在炮臺山發掘到的一隻巨耳造像。此外還有一些非泥塑而是石膏燒陶物殘片。所有這些文物現在均收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館。

三、伯希和探險團在圖木舒克的驚世大發現

經過在喀什地區一個多月的勘察之後，伯希和考古探險團于1906年10月26日離開該綠洲西部的玉代克利克（?rdeklik，野鴨地），在那裏搜集到幾種罕見的玉器殘片之後，于該月28日到達瑪喇爾巴什（Maral-Bachi，今巴楚縣）。他們于29日到達圖木舒克并在該地區一直停留

到當年 12 月 15 日，在那裏發現了庫車綠洲西沿唯一的一處佛教大型遺址群，因為在圖木舒克村不遠處，有一片完全被湮沒的遺址。斯文·赫定認為它是伊斯蘭時代的遺址。伯希和在該遺址中仔細地搜尋任何一星半點可為古建築斷代的標志。當他用馬鞭梢無意地扒拉地面時，便發現了一個屬於希臘—佛教風格的陶俑。這種半希臘半印度的佛教藝術，主要是誕生於印度河上游。它通過西域“胡人”的媒介作用，緩慢地通過印度河、阿姆河與帕米爾而傳入中國中原，乃至遠東的日本。新疆是該傳播鏈中的一個大站。圖木舒克有一座早於公元 1000 年的佛教僧伽藍遺址。這是在伯希和之前沒有任何人發現和指出過的事實。該遺址實際上應被稱為托古孜—薩萊或托乎孜—薩拉依（Toqqouz-Saraä，意為“九間房”或“九僧房”）。伯希和立即組織民工隊對該遺址進行發掘。

這項發掘工程以每天使用 25—30 名民工的發掘速度展開，共維持 6 個星期。他們對該遺址作了完整的平面測繪，出土了大批雕塑和木刻殘片、幾種奇形怪狀的陶器。他們在發掘後期，還發現了一塊類似淺浮雕陳列館的地方，淺浮雕雖已變得堅硬易碎和殘損嚴重，但仍不失其宏大氣魄。它們揭示了在 7—8 世紀期間，把中國西域與由印度—斯基泰國王統治下的犍陀羅藝術密切聯繫起來的紐帶。伯希和發掘到的文物運往法國後，先在羅浮宮展出，後又入藏吉美博物館，曾使法國乃至整個西方轟動一時。1906 年 9 月至 12 月 12 日之間，伯希和保留了一部寶貴的喀什與圖木舒克考古筆記。

圖木舒克（Toumchouq, Tumšūq）在突厥語中的本意是“鳥喙”，後來用於指崎嶇不平的地勢，具有指“岬角”

的意思。圖木舒克村莊也確實是向南于喀什河與葉爾羌河的沼澤山谷方向延伸的岬角。此地即唐之撥換城或跋祿迦（Barukha）之故地。在 18 世紀時，則是指從南部的蓋提（Markat）到北部的啓浪之間的整個巴楚（Bartchouq）的地區。此名相當古老，在穆斯林突厥人入主龜茲之前，它便被用于指在瑪喇爾巴什地區所操的兩種近似于閩語的方言：一種爲瑪喇爾巴什方言，另一種爲圖木舒克方言。“圖木舒克”這個地名既未出現在喀什噶里的突厥語大辭典中，甚至也未出現在米兒咱·海答兒的《拉失德史》（1541—1547 年）中。這是一個突厥文名稱，但它似乎曾在敦煌藏文寫本中出現過，作 Thum-šuk。德國考古學家勒柯克曾將該遺址斷代爲 4 世紀末葉或 5 世紀初葉。伯希和于 1923 年在《通報》中發表的書評指出：“我確實認爲，圖木舒克是中國新疆，至少是塔里木盆地北緣最古老的佛教遺址之一……但我覺得應將勒柯克教授提出的斷代時間推後 1—2 個世紀。”最後，伯氏認爲應將該遺址斷代爲公元 8 世紀。

伯希和考古探險團在圖木舒克發掘到的物品，主要有雕塑、壁畫、陶器和雜物。雕刻品或版畫大多是在托古孜一薩萊（“九僧房”）發現的，包括儀軌供像和單獨的雕像、淺浮雕和裝飾建築的浮雕。其中的雕塑品有佛陀、菩薩、天神、王公或下層世俗人、僧侶和修道山僧等。其主體應斷代爲 6—7 世紀中葉。雕塑的主要原料是黏土和“柴泥”。其技術主要是模製。那裏的壁畫主要是用于裝飾寺院的牆壁、天花板和地面的。其中的雜物可分爲宗教法器、金箔、舍利盒、還願物、世俗生活用品（珍珠、首飾、骨製品、青銅或其他金屬品、箭頭、玻璃片、布帛和繩索、掃帚等）。

它們現在均被入藏巴黎吉美博物館。

四、伯希和考古探險團在庫車綠洲的重大發現

經過在圖木舒克的發掘之後，伯希和考古探險團于1906年12月15日離開那裏，經阿克蘇和拜城，向他們的另一個重點發掘目標庫車綠洲前進，并于1907年1月2日到達庫車。他們一行在庫車共勘察發掘了8個月，直到1907年9月3日纔離開那裏奔赴烏魯木齊。早在該考古探險團離開法國之前，他們就聽說了有關庫車“明屋”（Ming-uī, Ming-oīg, 千佛洞）的信息，洞中覆蓋着7—10世紀的壁畫，而且德國人、日本人和俄國人均曾聞風而先期光顧過。但由于先前幾個外國探險團都過分地專注于“千佛洞”而忽略了幾座露天寺院，伯希和一行最終在那裏發掘到了一大批木雕、印鑒、錢幣、塗漆與繪畫的骨灰盒以及一大批寫本，特別是在一座寺院的院子裏發現了很多用被稱為“婆羅謎”文的印度字母書寫的寫本（龜茲文寫本）。它們都被運往了巴黎。

在此期間，瓦揚博士測繪了庫車綠洲的一幅平面圖，努埃特拍攝了克孜爾千佛洞的大量照片，伯希和本人又親自去考察了庫車以北那條過去將裕勒都斯河（Youldouze）與帖克斯河（Tékēs）連接起來的通道。

伯希和一行到達庫車時，德國考古探險團剛剛滿載而去。他們在那裏遇到了俄國考古探險家貝勒佐夫斯基，并與之保持友好關係。一直到1907年4月間，伯希和一行都停留在庫車周邊地區。後來，伯希和制訂了自己的考察方案：踏勘和研究庫木吐拉千佛洞，這批佛洞開鑿于木扎提